

五
興
文
史
資
料

第十一輯

宜兴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宜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录

纪念《宜兴文史资料》创刊五周年·····	俞志杰 (1)
献给《宜兴文史资料》·····	李海波 (3)
潘梓年传略·····	周云之 (4)
忆严师慈父蒋风之·····	蒋 青 (21)
松石切玉六十载——金石家徐廉甫·····	储建冰 (36)
怀念虹桥·····	徐 通遗作 (39)
闲话中秋节·····	余仁美 (41)
我出走台湾重返大陆始末·····	费树声 (44)
侨居生活片断·····	归侨吴 强 (56)
南洋生活回忆·····	归侨胡 范 (59)
我从事陶业的经历·····	鲍增泽 (62)
我和瑞纶绸布店·····	钱霖汝 (68)
我县水稻品种改革简况·····	蒋醒伦 (71)
宜兴茶叶史话·····	张志澄 (77)
旧时宜兴度量衡的积弊陋规·····	陈森岳 (85)
旧时城乡交通·····	路旭丹 (90)
消防今昔·····	储育民遗作 (92)

宜城茶馆旧话·····	吴仁扬遗作 (95)
漫话宜兴照明·····	储烟水 (100)
“宜兴道情”简述·····	蒋行知 (102)
✓ 历代宜兴县志编修考略·····	蒋靖辉 (114)
张渚“艺林社”·····	陈尧奇 白希贤 (117)
徐阁老画像赞·····	徐培泽供稿 (119)
徐阁老轶事·····	蒋云龙 (120)
周家楣典试益州日记摘抄·····	周颂高 (122)
宜兴太平天国王府·····	谈鹤鸣 (127)
名胜古迹楹联集锦·····	逸枫 云龙 逸芬 (132)
宜兴太平天国王府壁画·····	····· (133)

补白:

悼楠阳弟·····	朱荫松 (40)
宜兴鱼虾一奇葩·····	宗挺鲁 (99)
架弓山名称由来·····	杨 云 (113)
来函照登·····	县工商联编志办 (116)
宜兴文史资料目录索引 (第 1 —11 辑)·····	(139)
宜兴太平天国王府遗址 (照片)·····	(封二)
征 稿·····	(封三)

纪念《宜兴文史资料》创刊五周年

俞志杰

时代车轮滚滚，历史不断前进。当《宜兴文史资料》创刊五周年之际，我们纪念她的诞生，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自政协恢复工作以来，我们把文史资料工作作为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九八一年就开始征集和编纂文史资料。由于我县党政领导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和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五年来已征集史稿 940 篇，计 200 万字；已编印《宜兴文史资料》十一辑，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与好评。一九八四年，宜兴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被评为省、市政协系统先进集体。她不仅起到了积累史料、教育后代、团结人民、为统一祖国服务的作用；而且促进科技资料和经济信息的交流，为振兴宜兴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年来，我们通过《宜兴文史资料》与宜兴籍在外地工作的一些干部和科技人员联络了感情，激发了他们为建设家乡的热情。外地的同志来信说：“阅读《宜兴文史资料》，吸取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营养，了解到家乡优秀的历史遗产，光荣的革命传统。许多先驱者为祖国做出的卓越贡献，给自己极大的鼓舞和力量。”表示一定要为桑梓尽微薄之力。有的寄来亲手编写的科技书籍，或提供实用的技术资料，有的要为振兴家乡经济牵线搭桥，办点实事。上海市离休干部马琴英，主动上门为渚东乡筹办了食品厂，从上海杏花楼请来了

七名退休的高级技师，并引进了设备，仅花三个月时间即投入生产，能做月饼和其他糕点四十余种。她还为我县政府招待所及官林镇引进食品加工设备，并请来老师傅传授技术。我们还经常收到许多同志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的来信，不仅提供科研生产项目和自己的科研成果、技术资料，还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宜兴的种种设想。这就使文史资料由静变动，生机盎然。

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取得的成绩，这是贯彻全国文史工作会议精神的成果。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和抢救史料的紧迫感，逐步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在工作中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多种方法，扩大联系面，广开稿源，努力把政治、史实、文字三个关，提高刊物质量，并在全县各乡镇建立征集史料和发行书刊的网络。

今后，我希望《宜兴文史资料》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充实内容，提高质量，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当代人写当代事，应为历史见证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实录，具有翔实的史料性和可读性。充分发挥宜兴的人才优势，回忆历史人物、排比重大事件，记述社会风情，列出征集重点，落实抢救当地史料的任务。同时，我县人才辈出，仁人志士、专家学者颇多，我们也应系统记述，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更好地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

我深信，随着形势的发展，文史工作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宜兴文史资料》也将会越办越好。



献给《宜兴文史资料》

李海波

文史创刊已五年， 存真求实精神贤，
反映历史真面目， 体裁观点不拘限。
研究乡土编史料， 教育后辈学前贤，
“三亲”材料源源来， 董狐直笔至今传。

注：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晋卿赵盾因避灵公杀害而出走，其族人赵穿杀灵公。他认为责在赵盾，因在史策上写道：“赵盾弑其君。”旧时誉为“良史”。

潘梓年传略

周云之

潘梓年，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出身于江苏省宜兴县归径乡陆平村。生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哲学研究》编辑委员会召集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因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病故于狱中，终年七十九岁。

从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

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潘梓年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伯父都在乡镇当教师。潘梓年自幼从父在家乡私塾读四书、五经，父亲还教他学习数学，后随二伯父学习古文经典和地理知识，并写作诗文。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潘梓年产生了追求新文化的强烈愿望，执意去上海进了“大同学院”和“龙门师范”学习外语和现代科学文化。由于家境日益困难，毕业后在无锡东林小学任教。“五四”运动后，潘梓年再一次燃起了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的强烈愿望。一九二〇年，他毅然离职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攻读哲学、逻辑学和新文学，特别是鲁迅的新文学课给予他的影响最大。在北京大学，他经常阅读

《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新的思想、新的世界观在他的头脑里逐步建立起来。在北大学习了三年，一九二三年到保定育德中学教书。他应“保定育德中学文学研究会”的邀请，发表了八次关于新文学的讲演，深受师生们的欢迎。这些讲演后被编为《文学概论》一书，由北新书局出版。从此，他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积极追随者和参加者。正是他那种向往新生活的满腔热情，使他不止一次地遭到学校保守当局的打击和解聘。

一九二六年，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对腐败的军阀统治早已深恶痛绝的潘梓年决心参加到大革命的斗争中去。年初，他经北京奔赴广州参加革命，由于交通不便，又加中途生病，到达广州时北伐军已经出发。一九二七年初，他回到了上海，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在这种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他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生涯。

入党后不久，潘梓年就根据党的指示和其他两位同志（史曜宾、李暘谷）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宜兴县，进行重建中共宜兴县委的工作。潘梓年经党组织同意担任了县教育局局长的职务。他按照党的指示利用公开身份积极开展教育界的团结、争取工作。并奔走于南京、宜兴之间，为在江南发动秋收暴动作了不少准备工作。

一九二七年九月，潘梓年调回上海，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工作。在北新书局，负责主编《北新》、《洪荒》等进步刊物。

一九二八年秋，他受聘到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创办的上海艺术大学任教，主要讲哲学、逻辑学和印度社会史等。

一九二九年，在党的指示下，他负责创办了“华南大学”，任教务长，聘请知名的左翼文化界人士到校任教。在上海教育界打出了第一面红旗，把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一九三〇年，党派他到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机构做领导工作。开始是“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的负责人，后来调到“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当书记，并是“文委”（即“文总”中党的领导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丁玲曾回忆说：“一九三二年春天，我和田汉、刘风峙等同志入党时，就是潘老代表‘文委’主持的入党宣誓仪式。当时瞿秋白同志曾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潘梓年在“文总”工作期间，广泛接触和团结左翼文化界人士，跟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潘梓年还担任了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的总编辑，丁玲当时的爱人冯达是社长，联络地点就设在上海四川北路昆山花园七号丁玲家中。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他到丁玲家中联系工作时，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他和丁玲一起被捕了。

钢窗生活的磨练

潘梓年被捕以后，先被拘留在上海警察局拘留所，后被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丁、潘的被捕，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愤慨。当时由柳亚子、鲁迅等组织了“丁、潘营救委员会”，公开向社会呼吁营救，要求立即释放。蔡元培、邵力子等知名人士也写信给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释放。

潘梓年被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后，敌人派了两个

叛徒向潘梓年劝降，其中一个是他被捕前的直接领导人，另一个据说是他的学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潘梓年在叛徒面前正气凛然，侃侃而谈，毫无惧色。敌人劝降无效，就对他施以酷刑，进行残酷折磨，妄图迫使他就范。但他始终视死如归，没有向反动派低头。结果被判处无期徒刑，投入了南京军人监狱。

一九三四年，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统治，全国的革命形势再次遇到了挫折和困难。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反动派乘机散布红军“溃散”，中共“濒临灭亡”等谣言。敌人对政治犯更是加紧施行欺骗、利诱、分化和威迫等种种手段，妄图动摇政治犯的革命意志，而潘梓年的革命意志一直十分坚定，为了激励难友们对革命的信念，他在狱中写下了一首托物言志的《咏雪》诗：

一片一片又一片， 飞上河山皆不见；
前消后继更凶猛， 终把河山全改变。

此诗在难友中流传着，互相砥砺。后来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的重庆《新蜀报》上。诗的后面附有一段短文：

“前年在狱，见朋辈中有困顿经年，健康为毁而颓丧悲伤，自叹不辰者，由赋雪诗以勗之。”他在狱中还和楼适夷等难友们组织了一个“黑屋诗社”，办过一期手抄的《诗刊》，以此互相鼓励。

同牢的难友们在潘梓年的鼓励 and 帮助下，革命意志更加坚定，革命情绪越加乐观，大家对他很尊敬，称他为“老大哥”。在他的带领下，利用向狱方争得的权利，大家创造了一种很浓的学习空气，许多人开始攻读德文和英文。他自己

学习也非常勤奋，边学习、边写作和搞翻译，写出了三十万字的讨论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关系的《矛盾逻辑》（即《辩证逻辑》）一书，还翻译了二十多万字的书稿，由于当时的环境未能得到出版的机会。在生活上，他也尽力照顾难友，带动难友们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一些至今还健在的当年难友，在回忆起那段狱中生活时，仍然非常感激潘梓年曾经给予他们的鼓励和帮助。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全国出现了要求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声。潘梓年和楼适夷等难友一起以中央军人监狱全体政治犯的名义向外界发表一个宣言，要求释放全部政治犯，一致抗日。这个宣言送出去后，终于在一个小报上登出来了。潘梓年和楼适夷等还给冯玉祥将军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促成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给他们抗日的权利。西安事变以栖，在我党的努力下，再一次促成了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一九三七年六月，潘梓年等终于被党中央营救出狱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华日报》社社长

潘梓年出狱后回到上海。周恩来很快在党的市委机关接见了，要求他继续留在白区工作。要他和章汉夫一起去南京筹办《新华日报》，经党中央批准任命他为《新华日报》社社长。整整八年抗战，他一直战斗在党的新闻战线上，为争取抗战胜利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毫无疑问，国民党是被迫允许《新华日报》在它的统治区出版和发行的。一九三七年十月，潘梓年与其他同志在南京开始筹办报纸，不到一个月，筹备就绪并试版送审，这就大出国民党的预料。当时他们采用各种手段，百般拖延、阻挠，不让《新华日报》出版。由于南京即将失守，十一月下

旬报社被迫搬到了武汉。起初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党决定先出版《群众》周刊。后来经过反复斗争，才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出版了第一份《新华日报》。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前，《新华日报》又被迫迁到重庆出版。潘梓年留在武汉坚持到把最后一份报纸交到读者之手。当他和李克农奉命率领一百多名《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乘江轮向重庆撤退时，在北嘉鱼县燕子窝附近，所乘江轮被日机炸沉，二十五名同志不幸遇难，其中就有潘梓年的亲弟潘美年。他压下了失去亲人的悲痛，带领幸存的同志颠沛辗转，才抵达重庆。第二天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斗争，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群众运动，传播党的纲领路线和政治主张的有力舆论武器。因此，它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创刊起，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迫停刊的九年多时间里，国民党没有一天不在想方设法企图把这张报纸扼杀。作为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在我党南方局的领导下，没有一天不在同国民党的限制、破坏阴谋作斗争，而且处处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面。

报纸在武汉创刊不几天，国民党就雇用了一批流氓闯进了报馆的印刷厂，把机器全部捣毁。潘梓年和其他同志一起，向国民党进行了面对面的揭露和斗争，迫使他们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破坏活动，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国民党经常以“检查”为名，扣压《新华日报》的重要新闻，使得《新华日报》经常大决大块的开“天窗”。潘梓

年就在国民党中宣部召开的一次报界同业会议上，当众揭露他们摧残《新华日报》和其它进步报刊、破坏新闻自由的罪行，赢得了新闻界人士的赞扬和支持。

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皖南事变”的当天夜晚，周恩来派潘梓年、石西民到《新蜀报》、《新民报》等几家在重庆影响较大的民营报馆，揭穿国民党歪曲真相、封锁《新华日报》的阴谋，并向报界同人据实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阐明我党的严正立场，得到了进步报人的同情和慰问。

每当《新华日报》发表重要新闻或言论时，经常要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拦劫，他们没收报纸，殴打报童。因此，当报纸发行遇到阻挠时，潘梓年就动员并带领全报社的科室人员、工人一齐上街卖报，他是国民党特务经常跟踪的重点对象。在我党接收的国民党档案中，还清楚地记录着对他和夫人吴祖芳每次去周公馆（周恩来住处）的跟踪记录。

《新华日报》为贯彻党的抗日路线，一边要和国民党的限制、破坏阴谋作斗争，一边还肩负着团结各界爱国志士一致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潘梓年是起着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以《新华日报》社社长的身份在文化界、学术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郭沫若、马寅初、邹韬奋、陶行知等社会知名人士中间，与他们交换意见，邀请他们为报纸撰稿。为了团结学术界进步力量，由他发起组织了“中国学术研究会”，使一批倾向进步的大学教授和许多埋头书本的学者，投入了抗日民主斗争的洪流。《新华日报》每年举办创刊纪念活动时，都要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通过这些联系和接触，进一步密切了党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关系。当时重庆新闻界还组织了“各报联合委员会”的职业团

体，还有《新蜀报》发起的新闻同业聚餐会，潘梓年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以团结新闻界的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分子。《新华日报》在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在潘梓年等负责人的主持下，实际上已经成了我党团结社会进步人士一致抗日的重要阵地，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赞赏。

无论工作多忙，潘梓年从没有忘记自己是党的宣传理论工作者。就在他出狱后不久，写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的小册子《争取抗日胜利》。在九年多的时间内，他曾为报社写过数百篇社论、代论、专论和其它署名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阐明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制造分裂、反对共产党和镇压民主运动的各种阴谋，为争取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年邓初民曾生动地赞誉潘梓年“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务”的孺子牛精神。董必武也曾以“如君党性实堪钦”的诗句赞扬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奋斗在党的教育战线上

潘梓年于一九四七年三月撤退到延安后，开始在党中央城市工作部当研究室主任，为迎接全国解放和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他被派到河南郑州（后来迁到开封、武汉）筹办一所培养干部的新型高等学校——中原大学，并担任副校长、校长和党委书记，为我党在全国的胜利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一九四九年五月他被调到武汉，先后担任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委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等职一直到一

九五四年。在他担任中南教育部部长期间，首先面临的繁重而复杂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中南地区的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六省和广州、武汉二市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中、小学校的接管工作。这是一件工作量大、政策性强、困难很多的工作。当时在新解放区，相当多的教师不了解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情绪不够安定，有的人准备离开学校改做其它工作，更多的教师是被动地等待接管。潘梓年为了领导好接管工作，首先不折不扣地贯彻了党的“维持现状，逐步改革”的方针和对全体教师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从而极大地安定广大知识分子的情绪，使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他多次深入到武汉大学等院校，找学校领导和专家、教授们座谈或个别谈心，宣传党的教育路线、接管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使接管工作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接管工作中最困难的是处理好教会学校的问题。潘梓年一方面在政治上对这些学校的上层分子作必要的争取和斗争，争取他们支持接管；另一方面是充分做好团结广大正直、爱国知识分子的工作。由于国家对他们也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继续进行招生，使得绝大多数教职员工和学生积极拥护接管，并且安下心来坚持教学工作，终于在很短时间内顺利地完成了对这一批教会学校的接管工作。

在完成学校接管任务后，很快就开始了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这又是一件复杂、细致、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潘梓年除抓好武汉大学这个重点外，还到河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市作了普遍的调查，听取了一些教育厅、局长和大学校长的汇报，召开了各种教师座谈会，具体了解各地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教师力量、教材和设备情况，听取他们对院系调整的各种意见，从而使中南地区的院系调整工

作顺利进行。

潘梓年十分重视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经常去武汉大学拜访学校的领导、专家和教授，以十分尊重的态度和他們亲切交谈，相处得很融洽。有的老专家说，潘梓年自己就是一位学者，最了解、尊重知识分子，也最能团结知识分子。他还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去广东各地调查中小学教育的情况，发现了许多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过“左”做法。调查组及时用书面和电话向他作了汇报。他还亲自到广州，向当时的华南局书记陶铸汇报了这些情况，引起了陶铸的关心和重视。钱俊瑞部长曾在中央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肯定了调查组的工作。

创建哲学社会科学部 和从事哲学研究所的工作

一九五四年潘梓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具体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并筹备出版我国第一份哲学理论刊物——《哲学研究》，作为推动全国的哲学研究工作和团结全国哲学工作者的重要阵地。经过多方努力，《哲学研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正式创刊。次年六月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他任学部委员和学部副主任（主任为郭沫若院长兼任），并担任学部分党组书记。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成立哲学研究所，他兼任所长。

在此后的十多年中，潘梓年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动全国的哲学研究上。一九五六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他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强调，哲学研究工作的任务是极为繁重的，但“目前从事哲学研究的队伍还很小，具有一定研究成果的哲学专家特别缺乏，哲学中的许多学科还是空